

# 时代的精神状况与文学理想的浮沉

□赵勇

我总觉得文学理想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不需要谈论。一旦我们需要谈论它时,就意味着它已出现了问题。

远的不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总体上是不存在理想问题的。那个年代虽然有对历史创伤记忆的书写,也有种种迷惘、感伤、苦闷与困惑的文学话语,但作家的写作都很真诚,文学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向上的精神气质。1981年,汪曾祺写出《大淖记事》后说:“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屎桶。……我去看‘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40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祺反复提到他写的是“向往”,而在在我看来,这种向往其实就是文学理想。

实际上,这种向往也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里。王蒙的《春之声》,张承志的《黑骏马》与《北方的河》,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铁凝的《荷花》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把作家自己的理想转化成了某种文学理想,文学也因为理想之光的烛照,一下子有了精气神。于是有必要追问,为什么文学理想在80年代不成其为问题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以为与那个年代的总体氛围关系密切。李陀说:“80年代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有激情,觉得既然自己已经‘解放’了,那就有必要回头看看自己已经历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往前走,看历史又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马上做什么。”(《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53页)这种说法很有道理。80年代的过来人回想一下,李陀所谓的激情其实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之类的歌曲唱的是激情,《一个和八个》《红高粱》之类的电影演的是激情,而“美学热”、“全

民读书热”、“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等,也无不与激情有关。1988年5月,我曾参加在芜湖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亲眼目睹了分组讨论时那种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的辩论场面。显然,那也是一种激情的体现。如此激情燃烧,让80年代变得生机勃勃,理想主义的疯长也有了合适的土壤。

文学理想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勃兰兑斯曾经谈论过1830年代对于法国文学的重要性——类似于文艺复兴似的时代精神状况,作家亲自动手足的思想交流与艺术批评,共同催生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参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第8—18页)198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状况也颇有点法国当年的味道。西风东渐、思想解放、创作自由、人道主义、启蒙精神等等,让作家们焕发前所未有的写作热情。这个时候,写作活动不光是文学理想的呈现,同时也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某种预演。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作为五四文学的继承者,80年代的文学最大限度地接通了鲁迅所描述的文学理想,也把文学理想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90年代的来临,文学理想或被搁置或被抛弃,文学开始“向下”滑翔——与80年代文学形而上的精神气质相比,90年代的文学更多关注柴米油盐、饮食男女之类的日常琐事。1991年韩少功说:“前不久我翻阅几本杂志,吃惊地发现某些技术能手在活得无聊,如果挤干他们作品中聪明的水分,如果伸出手指头查地图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的几句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它们无论怎样怪诞怎样荒唐怎样随意性怎样散漫,差不多绝大多数作品的核心(——我那时不经意地使用‘内容’这个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因为偷情,所以大倡人性解放;因为乏味,所以怨天尤人满面悲容。这当然是文学颇为重要的当代题材之一。但历经了极左专制又历经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国民们,在精神的大劫难大熔冶之后,最高水准的精神倘若只是一部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书

书,这种文坛实在太没能耐。”(《灵魂的声音》)当偷情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时,我们当然不能说这就是文学的理想或理想的文学。而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也已证明,文学逃避灵魂问题去处处往就是肉欲之乡。在这种书写中,作家的灵魂麻木了,读者的要求降低了,文学的理想也暗淡了。

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局面依然与时代的精神状况有关。90年代以来,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等等盛行,却唯独没有了理想主义生长的地盘。而那些众多的主义不光是对理想主义形成了一种挤压,也对它构成了一种消解。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器”成为一个时代的重点琢磨对象时,它当然不可能在“道”的层面上有所作为。同时,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引领下,人们也开始远离“道”,嘲讽“道”,形而上的追求仿佛成了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1993年,关于“躲避崇高”的争论和对“伪崇高”的批判,置于当年的历史语境并结合有的论者的中庸思想分析,或许这种批判本身并无多大问题。但今天看来,“躲避崇高”这种提法显然也是对流行时代趣味的一种呼应与确认——当时时代开始了“下行”的历程后,作家没有显出超越之姿,而是委婉地强调着与光同尘的合法性。

被这样一种时代氛围笼罩,文学已不可能有太大出息。在这里,我当然不是说90年代以来的文学就一无是处,而是说没有了文学理想之光的照耀,文学已显得真真切切。于是,文学要不描写的是一地鸡毛似的无奈人生,要不体现的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苟活哲学,还有《废都》那样的颓废相,《上海宝贝》那样的暴露癖,再加上“私人化写作”的盛行,“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的泛滥,文学陷入到媚俗(kitsch)叙事中而不能自拔。李建军说:“从精神上,我们时代的文学的确存在着着一股邪气。在某些作家看来,文学本来就是变态的、畸形的,而作家天生就是一群‘莽汉’,一群在道德上享有放纵特权的‘糙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一些作家把自己的兴趣,牢固地

锁定在描写性欲、金钱、权力和暴力方面。不是说这些内容不能写,而是他们的叙事态度是病态的,流露出的格调和趣味是低下的。(《文学主于正气说》)李建军思考的问题是今日文学正气不足邪气有余,他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触及到了理想主义退场之后文学的萎靡之相。

文学的萎靡之相当然是时代精神状况的产物,而这种精神状况首先作用的却是作家,这就不得不涉及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在我看来,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虽然说起来复杂,但有两种关系更值得注意:其一是顺应,其二是反抗。当时代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象时,顺应时代便能让作家身心舒展,文学也会呈现出刚健之风、进取之态,盛唐时代的诗歌便可作如是观。而当时代变得物欲横流或萎靡不振时,顺应便成为一种共谋,文学因此也会遭殃,这时候就有了反抗。反抗是作家的自我拯救,同时也是让文学振作起来的一种手段,但势单力薄的反抗往往又会成为堂·吉珂德式的举动。当然,顺应与反抗也并非那么纯粹,许多时候它们都相互纠缠,从而让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暧昧。比如歌德已是一位伟大作家,但恩格斯却依然分析出了他与时代关系的矛盾性:“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庸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不对这种庸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庸俗气;相反,倒是庸俗气战胜了他;庸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庸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在柏林的德国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这里特意提到了德国的庸俗气,那应该就是当年德国的时代精神状况。连歌德都被这种时代精神击而无还手之力,可见其庸俗气的强大。

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中其实也是存在着一股庸俗之气的,但许多作家或者浑然不

觉,或者予以认同。如此一来,文学自然也就浊气上升,清气下降,失去了清俊挺拔之姿。这其中自然也有反抗的作家,但他们的言行却一度受到批判和嘲讽。遥想90年代中期的张承志和张炜,他们曾有过“抵抗投降”的激烈言辞,今天看来,或许二张就是抵抗庸俗之气的先知先觉者。然而,不但他们被扣上一顶“道德理想主义”的帽子而遭到攻击,就是“抵抗投降”的先驱鲁迅先生也受到了牵连。在这种质疑、嘲讽与批判中,反抗时代的流行趣味不但成为尴尬之举,而且似乎也成了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正是由于诸多作家与时代庸俗之气里暗里的合谋,理想主义换算成道德理想主义后被清剿出局,文坛或文学从此进入到你好我好他好的太平时代。

海德格尔说,贫乏的时代往往会隐藏着存在和遮蔽存在,诗人的职责在于认识时代的贫乏,进而让存在敞开。(《诗·语言·思》,第85页)这当然是对作家的高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很可能还难以企及。那么,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可以向恩格斯所批判的歌德学习,退而求其次?如此殷殷之后,作家在顺应与反抗时代之间游走,进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这时候,他们的作品或许才能呈现出灵魂的悸动,心灵的歌哭,而不至于成为一种无病呻吟的平面化的东西。

然而,学习歌德也颇不容易,因为歌德是非常看重文学理想的。他认为,歌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艺趣味是前进而不是倒退的”(《歌德谈话录》,第86页)。他指出,近代文艺界之所以弊病多多,原因在于“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同上,第92页)他呼吁:“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地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同上,第137页)这所谓的前进的文艺趣味,作家高尚的人格、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都可看做歌德对文学理想的向往与追寻。我们的作家也能形成类似歌德这样的感受与思考吗?我不清楚,但还是希望他们多少能有一点,因为这是让我们的文学有大出息的基本前提。

## 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6)

## 人更应该看到的东西

□红孩

了灯盏,给了我们无穷的信念与理想。我可以肯定地说,20年前上学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文学启蒙无论如何要比20年后的年轻一代要影响大得多。因为,在物质相对贫乏,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文学更容易给人带来精神的向往与寄托。

即使如此,当时的人们吃的是窝头咸菜,可看的却是《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妮娜》,听的是《红岩》《暴风骤雨》《李自成》。我们不能说当时的人们追求的有多么崇高,但看名著听经典确实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如今四五十岁的人们,每当谈到文学,都会怀念上世纪80年代前后文学最热闹的日子。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就是我们国家思想解放的晴雨表。诚然,让文学担当政治的功能是不合适的,可在特殊的年代就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历史的重任。虽然30余年过去了,可我仍为那一批作家、艺术家感到光荣。正是因为他们敢于铁肩担道义,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会不断创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10年第十一期要目

本期看点:感人肺腑的爱情报告文学《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及相关的...

西湖 2010第十期要目 新锐 安庆小说 我相信写作的孤独(创作谈)...

中国诗歌 2010年第十卷要目 主编:阎志 头条诗人 大地之殇(组诗)...

当代文坛 2010年第六期要目 西部批评高地 中国文坛重镇 名家视域 我国大学生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调查报告...



## 开辟出前景广阔的学术新天地

——评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 □张媛

国际报告文学兴起于19世纪末,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这一新学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是宝藏总会被睿智的探寻者发现、开采、收获。30年来,尹均生在寂寞冷清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园地开拓、掘进,开辟出新天地,也收获了丰硕果实。1990年,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反响。但他不满足已有的成绩,经过20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又奉献出长达50余万字的厚重之作——《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这部著作的学术体系建构更加完整、饱满,为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进一步学科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虽然是作者30年研究的集大成成果,却有着非常严谨缜密的内在逻辑结构。全书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板块对报告文学追本溯源,全面梳理了欧美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第二板块在国际报告文学发展的宏观视阈中追踪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足迹与风采面貌;第三板块将报告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进行理论层面的建构,凝聚着作者对这一文体形态及其美学品格的深入思考和独到创见。这三大部分脉络清晰、纵横贯通、经纬互补、层层推进,既有恢宏大气的全景俯瞰,也有精雕细琢的个案剖析,整体框架臻于完备。

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立场出发,考察20世纪世界社会与政治革命风云、经济与文化演变潮流,从特定时代的综合影响因素中揭示文学变革与社会变迁之间的敏感关系,有力地论证了报告文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兴文体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思想准备,在此雄厚的阐释基础上概括出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品格与美学特质,得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结论——“报告文学在时代和社会需要中产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新闻记者和作家共同创造的新闻文学形式”,“它面对现实发出急迫的呼声,有着特别敏锐的思辨与判断,挟带着喷涌式的诗情……它具有自己特殊的艺术个性,尤其以真实、急迫和激情,冲击读者的心灵”。

作为一部厚重的国际报告文学论著,显然不仅要要求著者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还必须具有详尽而扎实的资料占有。由于

国际报告文学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普遍关注,译介的原始资料和文献十分匮乏,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十年披荆斩棘的考察和持之以恒的密切跟踪,拥有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吸纳了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些新观点、新方法,使自己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拓展和跃进。作者强调“个案式”研究对于学科建构的重要意义。在这部著作中,他精选出近30位中外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作为个案,涉及的代表性作品50余部(篇),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可谓包蕴宏赡,但每一个案研究,都具体而深入,精辟而丰满,同时它们又不是零散的单篇评论,而是与国际报告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态势以及所代表的审美精神密切联系,互为佐证的。

在作者的这部新著中,我们还看到其在报告文学理论建树上的更大进展和成就。其一,通过对报告文学产生的时代社会原因及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的深层考察,通过对现代社会学受众了解社会需要和审美心理变异的全面洞悉,从发生学、传播学、接受学的多维结构中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功能和精神内核进行了深度阐释,其中有许多经得起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的真知灼见。其二,对报告文学的诗学观照和美学研究,极大提升了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准。他认为:“仅用文学的轻骑兵来阐释报告文学的文学品位与价值已不能表达其文体的美学特征了。”因此他以“博采众长、不拘一格”的开放的美学观与文体意识对报告文学“新闻性与文学性相统一”、“思辨色彩与艺术美感相契合”、“现实性和史诗性和谐兼容”的文体形态及美学品格阐发个人独到新颖的见解和认识。其三,从全球文化视野审视世界性纪实文学(除了报告文学之外,还有报告小说等其他纪实性文体)兴盛的潮流与趋向,在理论层面,力求概念界定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对报告文学与报告小说及其他非虚构文体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辨析,非虚构文学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进一步拓宽深化;同时,由世界纪实文学同趋异域的联系观察和区别论断,探究当代审美意识、审美方式、审美价值的多元空间与嬗变意义,具有敏感的前瞻性和充分的学理性。此外,该书激情与思辨辉映的行文风格,不仅增强了学术论著的征服力,也铸成作者富有个性化的学术形象。